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4.004

■ 毛泽东研究

调查研究: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①

乔 凯¹, 齐玉龙²

(1. 蚌埠医学院 药理学系; 2. 蚌埠医学院 党办,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具体表现在:调查研究活动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础;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调查研究规定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调查研究实践、创新调查研究理论和形成调查研究制度。

关键词: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基础;理论构成;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4-0020-05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 Key for Mao Zedong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QIAO Kai¹ & QI Yu-long²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2. Administrative Office,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s the key for Mao Zedong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re the fundamental practice bases for Mao Zedong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ought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ory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theory for Mao Zedong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pro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l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Mao Zedong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fact that Mao Zedong realiz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ells us that we sha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leading Party cadres shall increase the practice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nnovate the theory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form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actical basis; theor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命题和任务。

① 收稿日期:2013-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KS059);2013年安徽省高校质量工程项目(2013szxm032)

作者简介:乔 凯(1983-),男,安徽蒙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制度规定的品格和实践探索的特征,毛泽东总是从实践、理论和制度3个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而毛泽东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是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我们有必要从实践、理论和制度3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 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1]。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终于完成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调查来建立社会理论,他拟定了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提纲和《工人调查表》。恩格斯为了解工人的具体情况亲自到许多城市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共计21天,最终写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论》等都是通过调查研究,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伟大胜利。

(一)大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同学“游历”千里,试图通过“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来熟悉和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起初,毛泽东认为城市工作更为重要,理应优先得到解决。1924年,毛泽东因病回湖南老家休养,同时利用各种渠道作了多次调查活动。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3]107}。此后,毛泽东经常深入工矿和城乡,考察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通过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进而指出动员并组织农民参加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否则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1927年,为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进行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调查区域覆盖衡山、湘乡、湘潭、醴陵和长沙等湖南五县,在获得珍贵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田野研究作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指挥打仗、行军的同时,始终不忘调查研究工作。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开辟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阐释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论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4]。1930年前后,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进行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长汀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写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报告。从文本来看,毛泽东正是通过调查对农村根据地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土地政策、阶级状况、文化教育、商业交通、家庭伦理和宗祠族权等情况才有了大致了解。他曾明确指出:富农与地主的区别是在寻乌调查后明晰的,进而提出差异化的解决策略;雇农与贫农的不同是在兴国作直接调查后明白的,进而重视发挥贫农团的作用^{[5]22-23}。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1948年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为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1948年3月26日到达兴县蔡家崖,毛泽东对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进行了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向区县干部、土改工作团成员和贫农团代表了解农村群众动员、土地占有和阶级比例等情况。1948年4月7日,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邀请村干部和贫农团成员参加座谈会,了解当地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和土地改革情况。4月11日,毛泽东来到阜平城南庄,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参加了由

任弼时主持的阜平、曲阳和定县三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汇报会并向与会干部调查了解情况。得益于这些具体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对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整党整军、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等情况有了准确而细致的了解与掌握,并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调整。这在毛泽东撰写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中都可以得到很好地反映,如《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6]。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研究活动

建国后,毛泽东开展的调查活动并不象革命战争时期那样顺利,而是历经反复、比较曲折。在过渡时期,毛泽东对全国很多区域进行视察,调研不同行业情况,倾听当地干群的呼声,并发动党内领导干部进行大量调研活动,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富有成效^[4]。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党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局面。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分别带领调查组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结果。此后,各级政府和领导纷纷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党中央发现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条例和政策,不利局面也迅速得到扭转。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7]148}

二 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

毛泽东在开展调查活动的同时,非常注重对调查工作进行提炼和总结。他通过调查不仅写下了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田野报告,为把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供了借鉴和启示,而且将相关感受与体会形成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8]。这些思想涉及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明确目的、重要意义和正确态度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其中,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其调查研究理论创立的标志。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方法既是正确的工作策略,又是有效的领导艺术。他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那种不对矛盾的历史情况和客观实际进行调查就瞎说一顿的错误做法,并认为这种应被共产党员视作耻辱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大量存在。为此,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1}。为让更多的党员干部认识到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坚决对“唯书”、“唯上”的不良倾向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曾明确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如理论与实际有效沟通的桥梁是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的中心环节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唯一方法是调查研究。

(二)调查研究的明确目的

毛泽东高度肯定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但并不认同为调查而调查这种做法。他反复强调明确的调查目的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在有问题需要解决时才应进行调查研究。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推翻反动政权,消灭地主剥削,打倒西方列强,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当时党内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缺乏了解,必须通过深入实地的直接调查才能弄清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合理的策略。在遇到问题、面临困难时,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呼吁应该亲自到实地看看、走走、问问,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加以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对于调查与解决问题的关系,他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5]3}。

(三) 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认为,采用科学方法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概括起来说,毛泽东运用的调查方法既有典型调查,又有一般调查;既有直接调查,又有间接调查。毛泽东曾把典型调查比喻为“解剖麻雀”,把一个地方的各个方面研究清楚、透彻,然后推广到其他同类地方,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就有了基本了解。毛泽东以典型调查为主,但不忽视一般调查。为了确保调查材料的全面性、准确性,毛泽东把点上的材料与面上的材料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对照,进行多点综合分析^[9]。毛泽东进行实地调查的主要形式是开调查会,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实地调查具有深入、准确的优点,但是获得的材料是局部的、静态的。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他也重视间接调查方法,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和报刊杂志,以使调查材料具有广泛性、全面性。

(四) 调查研究的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重要途径,但是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保障。一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从存在的社会事实出发,根据调查得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研究结论的产生应该在调查活动结束后,而不是在调查活动开始前。二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态度,拜群众为师,以小学生的姿态进行调查研究。换言之,我们的调查要聚焦基层、深入一线,向群众请教,抱着学习的心态。因为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倾听群众真实呼声,最终制定出符合群众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决策。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调查者一定要获取群众的信任,与之建立和谐的关系,这样群众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调查才能取得丰富的真实材料;否则,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调查,必然得不到群众的配合,难免会陷入“走马观花”、一知半解、粗枝大叶的境地。

三 调查研究规定: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了一套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呼吁党内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活动,积极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抗日战争时期,经由毛泽东起草、党中央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制度化、规范化。

(一) 调查研究常态化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为了提高指战员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水平,就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下来。1929年9月1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赴上海,曾向中央军委就调查研究工作汇报三点:一是红四军把调查研究作为优先进行的工作;二是调查研究活动组织化程度较高;三是调查表的制定由政治部负责,项目内容比较丰富。同时,红四军在第九次党代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到调查研究工作,强调这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此外,红四军政治工作纲领中有调查研究方面的内容,对负责制作和下发调查表、指导和督促调查统计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10]。

为了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毛泽东于1931年4月2日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在通知中首先提出并得以具体阐述。在这一通知中,毛泽东提出从事调查需注意几个方面:调查者必须对调查活动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调查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繁琐,对大量数据进行统计;调查者应使用阶级分析方法,防止将不同人群的阶级阶层情况弄错^[10]。

(二) 调研内容系统化

20世纪40年代,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整顿党内的党八股、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风气,毛泽东认为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确保党内领导干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党中央于1941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调查

研究的专门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简称《决定》)是由毛泽东起草的,自此以后,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首先,《决定》指出:我们要辩证地认识20年来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既取得成绩,也存在不足。其次,《决定》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党内尚未形成共识,很多同志并没有认可这一真理,不进行系统的调查就制定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决定》指出:我们党不断壮大,担负着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不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要在对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国情、省情以至县情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动员各方力量参加革命。最后,《决定》指出:调查研究机关应在党政军机构内普遍建立,作为实施调查研究的直接推动力量,同时,要求把党政机关人员调动起来作敌、友、我三方阶级、文化、军事、经济、政治情况的详细调查,也可以学校为基地,培训获取敌、友、我三方真实情况的知识和经验^{[11]360-363}。

(三) 调研机构多元化

《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是《决定》的配套文件。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主要承担国内国际阶级、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调研,下设三个部门,即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和调查局,二是各独立区域省委或党委、南方工委、上海市委、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华中局和北方局等成立调查研究室,负责管辖范围内敌、友、我三方阶级、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情况的调研,形成研究报告和调查总结。同时,区域调查研究机构应将调查资料交予上级领导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和指导也由中央调查研究局提供^[12]。

从党的历史看,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任务,而且以调查研究的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我们的,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13]。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从新时期的实际出发,努力从实践、理论和制度等方面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 [1] 李君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群众工作传统[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1): 16-22.
- [2] 邹春攸. 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3): 99-106.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4] 陆学艺, 徐逢贤. 毛泽东与农村调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J]. 东岳论丛, 1991(6): 7-2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6] 陈答才, 王明. 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116-12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8] 李增爱.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 20-26.
- [9] 彭承福. 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方法[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 12-18.
- [10] 孙克信, 佟玉琨.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理论[J]. 哲学研究, 1983(12): 15-2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刘意. 1941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观及当代价值[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2(1): 19-23.
- [13] 习近平. 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N]. 人民日报, 2013-07-25(1).